文化新论

新中介时代，电视的价值在哪里

□毛湛文　倪元景

当下，曾经作为“第一媒介”的电视似乎正在遭遇着来自新媒体的强烈冲击。收视终端的变化和新中介（new intermediary）的冲击，使电视媒体“遇冷”正在成为现实。面对这种情形，有相当多的文章从传统媒体的角度讨论了应对策略的问题，但是却很少有人思考过电视这样的传统媒体，在新中介时代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传统电视和新中介之间是水火不容的关系吗？电视媒体以及电视行业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在哪里？电视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当下电视的生存价值做出简要分析。

监测环境与记录历史是电视所具备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

从媒介发展史来看，文字的出现没有代替口语，广播的出现没有代替报纸，电视的出现也没有代替电影。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没有完全代替前者，而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不断拓展传播媒介的功能。从中可以发现，一种媒介是否会消亡，要看在社会上是否拥有其发挥作用的领域。

电视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则集中体现在它对社会环境的监测和对历史的记录上。电视在传播上虽然是线性和转瞬即逝的，但是电视却可以留下能够保存的音视频作品，从而沉淀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常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在电视提供的各类产品中，电视记录历史这一价值则是主要通过新闻报道实现的。

在有关传媒职能的各项表述中，监测社会环境往往是位于第一位的职能。“通过报道材料，我们每日任何时候都能知道我们想要了解的一直在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可以周期性地更新我们的知识。”社会急剧变化，而我们每个人的认识能力又有限，电视新闻的存在价值恰恰在于，让我们不断认识正在变化的世界，以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

电视媒体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了解世界的中介，人们之所以会信赖电视，都是来自于它长期提供的准确、可靠、客观的信息。当社会环境在短时间内发生剧烈的变化，如突发性事件、重大灾难时，电视的直播优势就更加凸显了监测环境的社会价值。

正如麦克卢汉强调的“媒介即讯息”，媒介的形式本身超越了内容的价值，在电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直播技术，也同样具有比内容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与新中介使用者个人化的记录不同，电视直播的记录依托于规模化、组织化、专业化的新闻资源开发与整合，具有新媒体无可比拟的专业优势。

例如，在2013年芦山地震发生后仅仅18分钟，上海东方卫视就组织启动了电视直播报道，联系该台驻川记者和四川当地媒体的记者，播发震感范围、破坏情况、救援组织情况，以及震区的山川地理背景和天气信息，成为公众在震后初期获得震区消息的最主要来源。虽然电视媒体无法做到像新媒体那样第一时间披露地震的发生，但是却能够依靠平时积累起来的“监测环境”的专业经验，提供对社会而言对最有用的信息，在监测环境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协调社会等其他功能。

此外，美国学者戴扬和卡茨定义的媒介事件也是电视社会价值的体现。“媒介事件”是指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也往往会成为人们生活中共同议论的话题。媒介事件对人们的吸引力，得益于电视直播技术所带来的“在场感”“参与感”，让每一个观看者可以亲历正在发生的历史。这同样表明了电视新闻在记录历史中的特殊作用。

无论是日常新闻，还是突发事件，电视媒体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的正是新媒体所欠缺的专业、权威、可靠的优势。可以说，电视在社会领域的独特位置，是其在经年累月的、持续的新闻报道中积累起来的，而环境监测的品质决定了电视对历史、时代记录的客观和深度。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闻立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重申“新闻立台”就是重申电视媒体存在的核心价值，也是对电视“社会监测者”和“历史记录者”角色的强调。

电视生存价值的实现需要依托于新中介的平台与技术

新中介分流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把它们带到了电脑、手机和平板终端面前，但值得注意的另一个事实却是，他们在新中介上收看的内容却主要是由传统电视业提供的。

例如国外最著名的视频网站Youtube，在建立之初吸引了许多网民上传自己拍摄制作的视频，定位一个原创视频分享平台。但随着人们原创热情的减少，以及该网站相继与世界主流广播电视公司的结盟，随着PGC（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专业产制内容）远远超过UGC（user-generated content，用户自产内容）的比重，Youtube到2011年后干脆把电视机频道搬到了网络上，转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网络收视平台”。

Youtube转型的这个例子，又把我们带回“内容为王还是渠道为王”这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上。眼下传统电视业的渠道劣势是一块短板，但另一方面这个行业却保持着强劲的内容优势。即使是在网络环境下，人们也更青睐电视提供的视频内容。新技术发展把以往家庭空间中围坐在一起观看电视的亲密感消解了，使网络收视取代了传统电视机的收视，这看似是对物质载体层面的电视媒体的消解，但实际上并未触动电视业发展的根基——专业化的内容。

可见，电视的社会价值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作为社会组织的电视台所提供的专业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渠道就不重要，相反，渠道却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内容的发挥，比如电视机这种局限在特定时空中的线性终端。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电视要想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除了保持内容优势，还必须填补渠道上的短板。

可以想象，当传统电视业不限于把电视机看作是输出的唯一通路，转身寻求更符合受众收视习惯的新中介渠道时，无疑将在客观上拓展电视内容的传播范围。如《中国好声音》第二年的网络版权以一个亿卖断给搜狐，就是拓展渠道的尝试。

这样的尝试对传统电视业并不是被动选择，主动拥抱新中介，反而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社会化收视”的新景象：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一边收看电视新闻或节目，一边在网络上同他人分享观看的想法和意见。近年来，春节联欢晚会就带有“社会化收视”的特征，在这样的大型媒介事件前，社交媒体等新中介负责提供吐槽点评、互动讨论的平台，而传统电视业则只需负责提供具有话题性质的内容。这种情形下，电视可能并非信息接收的唯一终端，但电视生产的议题却很容易成为其他终端上被关注、被热议、被争论、被调侃的焦点的源头。电视对社会热点的“引爆作用”有助于电视内容在新中介的平台上提升影响力，获得更多的关注度。而那些没有收看某档电视节目却看到社交媒体评价的人，则会因为周围人对这档节目的关注而去主动收看，产生新的收视需求。这对于电视业而言，是观众的“回流”，回流的前提则是这档电视节目的内容要足够好。

新中介一定程度上通过更便捷的终端分流了电视的观众，但观众也会因为高品质电视内容而重回电视机前。近年许多电视娱乐节目的收视率的攀升之路，很大程度上都是依托新中介平台的分享和互动实现的。这从侧面说明了电视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特殊的“社交价值”。

新中介不仅可以当作电视媒体实现价值的平台，亦可充当其提升内容品质的技术帮手。例如，数据新闻的走红需要电视媒体在新闻的可视化表达上有所突破。而各类新中介的应用软件，可以被传统电视业加以利用。如BBC Live频道对埃及骚乱的报道，这一频道除了全方位的电视新闻报道外，还对记者采集的新闻图片，结合谷歌地图进行了再加工，用互动图表的方法，对骚乱聚集地广场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的俯瞰式再现。BBC Live频道的记者甚至环绕营地一周，用相机记录下了营地的整体概况并用可视化的图表进行了原景再现。这里提到的谷歌地图软件就是对电视业而言一种实用的新中介技术。

传统电视业在搜寻内容素材时，也会借助新中介技术，甚至自己搭建中介平台。如BBC成立的“用户生产内容集成中心”，可以集中处理受众通过各种渠道提供的新闻信息，并提供给BBC的各编辑部和播出机构使用。这个中心本身突破了传统电视业的新闻采集方式，承担了内容素材库的搜集和分发作用。透过这两个例子，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传统电视业的生产环节还是接收环节，都能看到新中介的影子，服务于电视媒体监测环境、记录历史等社会价值的实现。所以，新中介并非只带来冲击，顺势而为的电视媒体完全可以开掘新中介的功能，从而达到电视传播中扬长避短的理想状态。

对公信力、专业品质、社会责任的坚守是电视发挥价值的保障

同新媒体和新中介相比，电视传媒组织有受过训练的专业的采编制作队伍，并且在几十年到几百年的发展中，积累形成了自己的公信力。但是，新中介时代电视媒介的公信力却是充满风险的易碎品。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环境下，一旦电视上出现移花接木的新闻镜头，或是立场偏颇过于主观的新闻报道，或是用陈旧的宣传套路来制作新闻时，就会很快被细心的网民指出问题，并迅即产生批评的舆论风暴，而参与批评的网民越多，电视媒体的公信力也损耗得越快。至于电视上出现明显有违职业道德的情况时，媒体多年积累的公信力有可能在强大的网络舆论面前一夜轰塌。

这方面有个典型的例子，2012年11月，在江苏教育电视台《棒棒棒》节目制作中，模特干露露现场与台下的观众爆发激烈的言语冲突，甚至口无遮拦，大骂脏话，后来这段视频被传到网上，引发众多网民的愤怒。江苏教育电视台的做法被指责为一种不顾社会责任的媚俗化炒作，也因此名誉大跌。与新中介对电视媒体的冲击相比较，电视媒体自身对社会责任的放弃，无异于自断出路，其消极后果自然要比所受冲击带来的影响严重得多。

传统媒体时代，电视的权威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收视的单向传播，造成受众对电视的意见反馈渠道有限。但随着新中介技术对公众话语权的提升，随时随地表达对电视的意见成为现实，并变得简单便利活跃起来。传统电视业目前要面对更加挑剔和仔细的观众，其自身的权威也面临着解构的危机。这种“围观”造成的压力，正在倒逼传统电视行业做出更严格的自律选择。所以，在新媒体开放的批评环境下，电视媒体要想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价值，就必须更加努力坚守好新闻的专业品质和责任。

新闻专业主义是一套职业化的理想和操作规范，真实、客观、法治等新闻理念都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组成部分，虽然它只是一种理念，但之于电视媒体尤其是电视新闻的，却是整个行业发展的灵魂和精髓。当前，电视新闻从业者职业倦怠的普遍，以及职业理想的迷茫和困惑，除了与整个社会转型的宏观环境有关外，也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缺位有关。

“那时候的年轻人，像打一场仗，敌人很明确：八股的文风，粉饰太平的惯性，站不起来的奴性，不以人为本的种种现象。敌人在，阵地在，杀气与斗志就在，因此激情燃烧……一转眼，二十年过去，敌人依然很多，可形象却日渐模糊，一时不知该怎样出手。更可怕的是，太多的战士早已忘了，当下最大的敌人，其实已经是我们自己。”这是白岩松把1993年《东方时空》开播的年代与当下所做的对比。

电视在传播渠道上的衰落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补救，而电视新闻人专业主义精神的衰落，才是真正的衰落。传统的电视业要保持权威和优势，要确立生存的空间，恐怕首先要做的就是让专业主义的精神复位，让新闻职业理想重新回归。

美“平权法案”在教育中遇到新挑战

□刘丽丽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其领土上生活着几乎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民族。虽然美国少数民族众多，但其民族矛盾却并不突出。究其原因，高于一切的国家法制原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法制原则时而强势，时而安抚；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一直在不断调整，不断改进。“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就是美国政府在上世纪60年代出台的一项重要的少数民族政策。

“平权法案”，最早始于1961年肯尼迪总统的一个反对歧视的10925号总统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雇佣并平等对待少数族裔。随后，在1964年《民权法》基础上以及几届政府的努力下，逐步发展演变成为一系列有关平等权益的法律、规范、政策，目的是消减对社会机构中不同群体的歧视，



帮助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少数民族和妇女更快地改变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劣势地位。具体是指联邦、州及地方政府或是私人业主、教育机构采用自愿或法定的行动，在入学、就业、晋升、颁发奖学金以及接受政府贷款和分配政府合同时，在竞争能力和资格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使黑人、印第安人、拉美裔和亚裔以及妇女享有优先录取、录用、晋升或优先得到贷款和政府合同的权利。许多大学使用了配额制度，让少数族裔得以按配额（不是全靠成绩）能够上公立大学。

1964年，约翰逊正式当选为总统。在内政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公平施政的改革计划。他认为平权的原则不止局限于平等的原则，而应该解释成对黑人等少数民族在就业和就学方面的优先考虑和优先机会。1965年6月，约翰逊总统在哈佛大学的著名演讲中对“平权法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你不能把一个才从很多年的手铐脚镣束缚中解救出来的人，立刻将他带到与别人并肩的起跑线上，对他说‘你可以和别人自由竞争’，并且相信这样做是绝对公平的。因为对于打开一道公平的大门，我们要做的不止这些。如果我们全体公民都能够从公平的大门下通过，那么所谓的公平，不只是权力和理论，更是事实和结果。”

然而，在长期的实施过程中，“平权法案”却成为了当代美国最有争议的法案。美国宪法学家罗森费尔德认为，平权法案形成了美国历史上独特的道德论争。一些大学也因为推行这一法案而被告上了法庭。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博文和前哈佛大学校长伯克在他们的著作《河流的形状》（The Shape of River）一书中，把“平权法案”在高等教育中的推行，比喻为密西西比河的河水，充满了各种波折和转弯才流向大海。

“平权法案”推行以来，几乎所有著名的大学和专业学校，都开始意识到他们必须在培养少数族裔学生中发挥作用，实施主动招录少数族裔考生的计划，并考虑在招生过程中接受合格的黑人学生，即使他们比大多数的白人学生的成绩和考试分数低。大多数学院和大学的领导人之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除了试图纠正过去的种族不平等之外，还有其他两个与学院传统密切相关的原因：首先，他们试图为全体学生营造一种包括不同种族、不同教育背景和不同观点的教育氛围；其次，他们普遍认为在企业、政府和专业领域需要更多的少数族裔，而且他们有特殊的机会可以在各行各业成为领袖。

从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到现在，黑人学生在高校中所占比例大大增加。根据美国教育部1997年的统计，从1960到1995年，25岁至29岁的黑人中大学毕业率已从5.4%上升到15.4%。法学院中从1960年的不足1%增长到了1995年的7.5%。医学院中黑人的比例从1964年2.2%攀升至1995年的8.1%。25岁以上的拉美裔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则增加了一倍，从1970年的4.5%增长到1995年的9.3%。根据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的最新统计，截至2005年，美国黑人大学毕业率已达到42%，但仍比美国白人62%的大学毕业率低20个百分点。

显然，从“平权法案”中获益最大的是黑人和拉美裔。虽说这个法案旨在保证所有少数族裔在教育和工作上的权利，然而在受益群体中除了黑人、拉美裔和土著印第安人之外，亚裔、犹太人或者东欧、南欧的移民们却没有被包括在内。而且，在法案的推行过程中时常会出现极端化现象，有些学校和工作岗位走到了不是少数族裔就不能申请进入的境地。占人口大多数的白人越来越觉得受到了“逆向歧视”。比如，一个家庭年收入15万美元以上的黑人学生，在各方面表现和一个家庭收入不足3万的白人贫困生大致相同。但是，那位黑人在大学竞争中仍然得到了充足的照顾，分数要求大大降低。那位白人孩子不仅得不到照顾，而且必须通过加倍的努力，以高得多的分数才能和那黑人富家子弟竞争。

以著名的密歇根大学为例，新生的入学总体评分，150分为满分，满100分必须录取。必要的毕业考试SAT成绩满分占12点，而少数族裔种族优惠分就占20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非常用功的非少数族裔青年，在SAT考试中得到满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么他将在总分上低于一个没有SAT成绩的少数族裔青年。2003年，密歇根大学两个白人学生为此诉诸法律，状告校方歧视白人学生。几经周折，这个案子最后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由于明显的不合理，近年来几个重点大学先后废除“平权法案”中若干逆向歧视多数族裔学生的项目。其中加州1996年11月通过著名的209法案，一举废除了“平权法案”在该州的实施，禁止州立大学在录取学生时考虑种族、性别和族群因素，取消了配额制度；10年之后，密歇根也踢开了这个法案。此外，密苏里州和华盛顿州等各个州也加入了加州的“同盟军”。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有8个州禁止在公立大学推行“平权法案”。其中，加利福尼亚、华盛顿、密歇根、内布拉斯加、亚利桑那和奥克拉荷马都是通过公民投票来禁止这一法案的推行。在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通过发布行政命令禁止。而在新罕布什尔州，是州议会通过法令来禁止在大学录取新生时考虑种族。

2014年4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支持密歇根州宪法的一项修正案：在该州公立大学的招生工作中禁止使用“平权法案”。这项6票赞成、2票反对的裁决实际上是为其他7个采取类似举措的州提供了认可，而且还可能鼓励更多的州出台措施，禁止大学在招生时考虑申请者的种族。它也鼓励各州采取与种族无关的替代方案来确保学生的多样性。

不容否认，“平权法案”在矫正社会不公、创造少数民族中产阶级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当前的美国正在走向一个富人主导的社会，201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的美国和英国迅速出现，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日趋加剧。如今美国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问题；最大的社会不平等因素已经演变为经济地位，而非种族。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西恩·里奥登对50年间考试成绩的“黑白差距”的分析表明：早年黑白学生考试成绩的差距，几乎比贫富学生之间的差距大一倍；而如今情况正好倒转过来，贫富学生之间的差距，比黑白之间的差距要大一倍。

因此，在贫富差距日益极端化的当今美国社会，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在此背景下，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更多考虑社会经济因素。也就是说，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政府和企业在录取和招募过程中，急需考虑的是经济平权，而非种族平权。

瑞典大学的科研经费监管

□高荣伟

瑞典的大学以鼓励学术研究和独立思考而享誉世界，而这一声誉更是由严格的科研经费管控和学术道德来巩固的。瑞典特别重视科研诚信和科研道德制度建设，对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的相关行为进行严格约束。

在申请科研项目时，瑞典高校要编写项目经费预算，预算编写得非常详细。科研项目的支出主要由6个方面构成：薪资、消耗材料、差旅费用、实验室设备、通信交流费用以及管理费用等。项目支出由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构成。目前，瑞典科研项目间接成本的比例没有一个统一的计算方式，主要由课题负责人和承担单位在申请时根据实际需要提出。

所有项目技术方案都采用同行专家评议进行，预算编制是否合理要由他们说了算。项目和设备申请在每年4月份提交，6—9月开始进行同行评议，10—11月确定项目立项。项目一般研究期限是3年。申请书中不要求有考核指标，主要看项目结束后有没有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会对以后的立项产生影响。

项目批复门槛高。2012年，瑞典国家研究理事会收到了约5400个申请，申请成功率20%。项目经费申请成功后，其开支灵活，但必须用于科研。项目经费主要依靠承担单位进行管理，按照规定报告经费使用情况。对于研究类项目，经费按月拨付，研究过程中若急需经费，不足部分则由单位垫付。理事会自己并不对项目经费进行审计，而是由大学内部和外部的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学校内部审计向学校董事会负责，项目结束后，如经费有节余，则需要收回。

校方对项目提供的管理和服务主要是确保执行有关项目经费管理的法律法规等要求，制定学校的管理规则，提供支撑服务。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报告经费执行情况，确保信息的真实完整，保证科研人员学术诚信。

学术腐败方面，瑞典称不上是一方净土。根据瑞典高教局公布的统计数据，瑞典全国高校查处的学术造假案件5年内翻了两番。2001年100余起，三年后翻番，增加到了200多起，2006年再度翻番，达到480多起。在查处的学术造假案件中，抄袭剽窃案件呈急剧上升之势。瑞典关于学术不端的定义是：“有意捏造数据来修改研究进程的行为；剽窃其他研究者的原稿、申请书、出版物、数据、正文、猜想假说、方法等行为；用以上方法之外的方法修改研究进程的行为。”英国《自然》杂志曾说，“评价一个国家的科学诚信状况，不仅要看发现了多少学术丑闻，还要看对这些丑闻的调查和处理程度”。近些年来，科技丑闻和学术不端事件在瑞典高校时有发生。对于抄袭剽窃等学术造假事件，瑞典政府不断健全机制，加大处置学术造假的力度。2007年6月，瑞典研究委员会和瑞典全国高校联合会联合向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政府在全国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统一机制，约束学术不端行为。2008年10月，时任教育和科研大臣的拉斯·雷荣博里在向瑞典议会提交的议案中宣布，政府决定成立一个常设机构，专门处置学术造假问题。这些举措对于瑞典高校维护正常学术秩序和学术道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法制基础。

科研唯有诚信，方有“大师”辈出。为治理学术腐败，瑞典已经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努力，瑞典高等教育与科研大臣托比亚斯·克兰兹指出：“为科研人员建立诚信档案，以法律法规来惩罚科研失信，是根治学术腐败、规范科研管理的一个必要举措。”

教育视野